

孙冶方同志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点滴

董 辅 初

孙冶方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很多。我想就他在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方面的几个特点谈一点体会，主要是作为自勉。

第一，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往往从微观经济问题入手

冶方同志是把国民经济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或者说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但是，他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往往从微观问题入手，或者说从微观上提出问题，把它们提高到宏观经济上来观察、来分析，得出宏观经济的结论。例如，冶方同志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当时他称为计划和统计工作方法制度或财经体制），就是从一些微观经济问题入手的，即总产值指标问题、固定资产折旧问题、利润指标问题、生产价格问题、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问题等等。他在分析微观经济问题时，并不是停留于这些问题的本身，而是从国民经济的整体上去把握它们，以解决宏观经济的经济体制问题。

举例来说，冶方同志研究过总产值指标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是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的，一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研究这个指标的内涵、计算方法、它同其他经济指标的关系、它在考核企业经营成果中的作用等等。这种角度的研究自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另一个角度则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利用这个指标来考核企业的经营状况所带来的结果，从这里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由此得出经济体制方面的结论。冶方同志研究总产值指标问题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就叫做《从总产值谈起》。这个标题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研究总产值问题只是把它做为起点，从这里“谈起”，他的目的是要解决“计划和统计的方法制度”问题。他在研究其它微观经济问题时也大体是这样做的。冶方同志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能给我们以什么启发呢？

我们知道，宏观经济问题同微观经济问题是有区别的，但又是不能分割开的。宏观经济问题往往会在微观经济问题上这样或那样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而且进一步说，对于许多宏观经济问题来说，往往必须对微观经济的问题有了了解，才能更具体、更深刻、更为透彻地把握和理解它们，从而正确地解决它们。

再以总产值指标为例。总产值指标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指标，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是不能缺少的，是不能被其它指标完全取代的。当然，这个指标是有缺陷的。有的缺陷是同我们对它“求全责备”有关的，例如，因为它过于“综合”，致使它不能稍微更加具体地反映一个部门、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情况，但这不是它作为一个综合指标之所以得以存在的根据。有些缺陷则是有实质性意义的，例如，按“工厂法”计算的总产值，会由于计算总产值的企业在组织上的变更（合并或分开）而影响其数值。这些具有实质意义的缺陷，当其同一种特定的经济体制相联系时，它就被赋予反映了经济体制本身的缺陷的意义。例如，总产值中包

含着重复计算的物质消耗。当这种缺陷存在于一种企业“吃大锅饭”，即没有盈亏责任的经济体制下时，它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把总产值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会鼓励企业去浪费原材料、利用价值大的原材料，而不必顾及这样做所能造成的企业的以至国民经济的负效果。因为，在“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下，企业不必承担盈亏的责任，企业所要考虑的主要是它是否能完成总产值指标的任务，而不需考虑在完成这项任务时是否能取得或增减盈利的问题。同时，在实行工业产品“统购包销”的经济体制下，企业可以不关心它的产品是否合乎消费者的需要。因此用总产值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果的最重要指标，就会鼓励企业象冶方同志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宁愿用九条狐狸皮去生产昂贵的大衣（因为产值大），而不愿去生产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用低廉的衣料制作的大衣。这个例子说明，从总产值指标这个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入手，使我们能具体而深刻地把握和理解国民经济体制这样的宏观经济问题。冶方同志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在研究某些宏观经济问题时，由于不能从分析微观经济问题入手，并把它们提到宏观经济的高度去观察、去分析，使他们不能具体地、深刻地理解这些宏观经济问题，从而给人以“隔靴搔痒”、若明若暗、浮光掠影的感觉，这样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理论结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在为了研究一些宏观经济问题而去观察和分析一些微观经济问题时，不能从宏观经济的全局和高度去把握它们，陷于就事论事的境地。

第二，理论要有力量必须求其彻底

从冶方同志的整个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时期以来，他执着地在追求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力图使他对一个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能够构筑成一座渠道纵横、互相衔接、四通八达的坚实的理论城堡。我们虽不能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但他确实在这方面努力着。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地阅读冶方同志的著作就可以看到，无论你从他所论述的哪个问题入手去追踪他的理论，他总会把你引导到他的理论的中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利润问题上去，进一步把你引导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效益问题上去，最后把你引导到他的价值论上去。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他那里，他不是就事论事地、孤立地、彼此割裂地去观察和把握那一个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的，而是从本来是不可分割的国民经济整体及其整个运行过程去观察和把握它们的，它们本来是可以互相通达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一种理论之所以够得上是一种理论，本来就不容许为了说明同一事物及其不同的侧面而提出的理论是相互否定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国民经济及其各个侧面时，我们的理论本来就应该应该是相通的，互相衔接的，而不能彼此打架。理论上的彼此相通和互相衔接，正是国民经济中各个问题的彼此相通和互相衔接的反映。而要使各个理论能彼此衔接，就要求理论具有彻底性。而要使理论具有彻底性，就不能让理论去迁就某些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某些现象，迁就某种主观愿望、需要或考虑。理论要具有力量，它必须是彻底的（当然首先它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我觉得，冶方同志的理论就具有这种特点。当然我们还不能说他已经完满地做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但是，至少从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来说，他是努力在这样做的。

我想，我们可以赞同冶方同志的经济理论，也可以反对他的经济理论。但是，不论是赞同或反对，有几点我们是必须向他学习的。

首先,毫无疑问,决不是每个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都有能力象冶方同志那样去试图建立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使自己主张的理论具有彻底性,使自己主张的各种理论能相互衔接一致,而不是彼此否定。这虽然也是不易做到的,但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去努力。有些同志不同意冶方同志的理论,这是正常的事,也是冶方同志所欢迎的。但是,他们的批评往往不仅没有使冶方同志信服,反倒被冶方同志抓住了“辫子”,并使他对自己的理论更具有信心,进而利用对方的批评去充实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象冶方同志所经常说的,对方没有击中他的要害,因为对方提出的理论不彻底,露出了破绽,对方没有从他的理论大厦的基石——价值论上驳倒他。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润指标的地位、意义和作用问题。有些同志反对冶方同志的理论,特别是反对他把利用利润指标比作“牵牛鼻子”的主张。但是,有些同志在反对他的理论和主张时,未能做到理论的彻底性(这里固然还有其他原因),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只能有“一定的利润”的主张,这就是说他们企图用利润的量的问题去取代他们所要批评的冶方同志提出的关于利润的质的问题。于是,反而被冶方同志抓住了。他反驳说:“难道‘一定的利润’就不是利润么?”我想,我们不是在这里去评判这段有趣的往事的理论是非,但这件往事确实给我们以启发:理论必须彻底,只有彻底才具有力量。

其次,我们知道,冶方同志是很坚持他那一套经济理论的,在过去政治批判时,有些人骂他“顽固不化”,而他则即使身处囹圄对自己的一套经济理论也丝毫不动摇。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这当然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锤炼出的无产阶级的坚贞不屈的精神、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敢于赴汤蹈火、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我想,支持着他的力量也来自于他的(至少是他追求的)理论的彻底性。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他对自己的理论想通了,他的理论首先并且至少能够说服他自己,而在长期的受批判中批判者没有能够提出使他信服的理论,反而使他对自己的理论具有坚定信心。这就是说,理论的彻底性不仅具有说服他人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支持一种理论的创造者的力量。哥白尼不向反动的宗教势力屈服,他的力量不也是来自于他对自己的理论的信心,来自于他的理论的彻底性么?

在理论的探索中,改变自己的观点是正常的现象。细细看来,冶方同志也改变了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例如奖金问题),他在作出这种改变时他同样自己想通了,说服了自己。我们有时看到有少数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经常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因为,他们在提出或赞成一种理论时,这种理论或者是不彻底的,或者他们自己对这种理论就没有想通,连自己也不能说服,这种情况是不利于理论工作的发展的,也是不利于理论工作者的成长的。

冶方同志经常说,他欢迎别人批判他,而且欢迎指名批判他。为什么?其中有一个道理,就是他要从这种批判中看看自己的理论是否彻底,是否站得住,并从回答这种批判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放弃某些不正确的理论,使他的理论越来越彻底。

第三,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的发展,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

冶方同志在治学上有一个可贵的特点,这就是问题抓准了就抓住不放,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我觉得,这是他在经济理论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所在。我所知极少,我想,可能不少大学问家都是如此。如果通读一下冶方同志从1956年起所写的著作,可以看到冶方同志反

反复在一些问题上做文章，这些问题有：价值、价值规律、总产值指标、利润指标、生产价格、固定资产再生产和折旧基金、技术更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大权和小权的划分、积累率等等。他在1956年夏率领我国国家统计局代表团访苏过程中，就抓住了这种种问题，并从这些问题中抓住了现在我们称为经济体制的问题。从那时起，他开始认识到（以后有发展）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富有效率和效果地运行。正因为他能从理论上把握这些问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从经济理论上入手，打破长期间统治着经济理论和影响着经济工作的“自然经济论”，建立一整套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是一件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事情，必须毕生精力去做。从此，他就抓住这些问题不放，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即使在监牢里也没有一天放弃过。

有些同志在看过冶方同志的一些文章后有时说：“还是他那老一套”。这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有对的地方是说，冶方同志的文章始终是他那一套，从1956年以来，那一套从基本的理论观点来说并没有改变；有不对的地方是说，那一套并不是“炒冷饭”。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这里很有值得我们向冶方同志学习的地方。这就是，他总是用他“那一套”结合当前的实际去探讨新问题，在这种探讨中去检验、发展和完善“那一套”。所以“那一套”并不是“那老一套”，而是“那发展着完善着的一套”。举个例子来说，党的十二大期间和以后，冶方同志为了论证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批判基数越大速度越低的论点，他又把他的关于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反对“复制古董”、加速企业技术改造的理论重新提出来了。乍一看来，“还是那老一套”，其实他是在用他那一套去研讨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运用得那样妙。他把批判基数越大速度越低的论点同提高折旧率、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反对“复制古董”的主张联系起来，是我不曾想到的。记得在1959年我在一本书中也批判过基数越大速度越低的理论。听了和读了冶方同志的主张，使我折服，深感我过去的批判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击中这种论点的要害。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冶方同志始终在探索新问题，从不停留在他已经达到的理论成就上。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

首先，研究任何一个理论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抓得准的，就必须长期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探讨。这样才有可能取得一点成绩。当然，这并不是说问题不能变换，但却不能浅尝辄止，蜻蜓点水。

其次，在这样做的时候，对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者来说，又必须紧密地结合实际去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去创新、去发展、去完善自己探索的理论。

这两点并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但要在理论工作上，多多少少能做出成绩，我觉得又非如此不可。

以上是我在长期受到冶方同志的教诲中粗略领会到的几点，也都是我自己没有做到，需要今后努力去做。冶方同志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上面讲的只是其中很少的几点。即使是这几点，我也觉得不敢说领会得恰当、正确。

1982年12月25日写于从北京飞洛杉矶途中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